



02

# 延安 文艺大系

—— 主编 刘润为 ——

延安文艺史卷·下

# 延安文艺大系

## 延安文艺史卷 下

主 编 艾克恩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第三编 新文艺方向确立时期

(1942.5 ~ 1945.8)



# 第一章 延安文艺座谈会

## 一、文艺座谈会的历史背景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根据革命和文艺形势发展的需要，由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出面邀请文艺家于1942年5月召开的。毛泽东在《讲话》的结论部分，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了座谈会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差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段讲话中讲了七个方面的实际情况，这七个方面，从全局着眼，既把当时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状况放在了世界总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之中，又把重点放在了对革命文艺的性质特征和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的把握上，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正确

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一）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从世界范围看，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由于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英勇斗争，打乱了侵略者的战略计划。到1941年10月，苏德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苏联红军制止了德军全面的猖狂进攻，迫使希特勒改为集中兵力，向南线作局部的但被认为是打击苏联要害的最后进攻，可以说这正是苏德战争乃至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的前夜。

从中国看，中国人民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此时正处于战争的第二阶段。在1941年和1942年中，日本侵略者集中主要兵力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加上95%的伪军与日军联合作战，致使抗日根据地缩小了，人口从1亿减少到了5000万以下，八路军则从40万减少到30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整个根据地正面临极端困难的“黎明前的黑暗”时期。<sup>①</sup>

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革命力量极端仇恨和残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诱降之下，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继1939年到1941年的两次反共高潮后，又积极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动用了二十余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妄图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日寇坚决抗击，加强反“扫荡”的斗争；对国民党则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与此同时，则是努力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实行了统一战线

政权的“三三制”政策，执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开展了“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和统一领导，开展拥政爱民和发展生产等工作，巩固和加强了根据地的实力，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进攻，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sup>②</sup>而延安文艺座谈会，正是在“整顿三风”过程中召开的，它既是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二）形势对革命文艺的迫切要求

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共产党和它的领袖在重视军事斗争的同时，一直非常重视文化军队的建设，重视发挥文艺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抗战以来就更是如此，早在1936年中国文艺协会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文武双全”，指出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是摆在艺术家、艺术家面前的“伟大的光荣的任务。”<sup>③</sup>刊登在《红色中华》副刊上的《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也指出：“在现时全国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把全国各种政治派别，各种创作倾向的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以无产阶级的文学思想来推动领导，扩大巩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力量，更是党和新苏维埃新政策下的迫切要求。”<sup>④</sup>1937年8月，毛泽东曾对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丁玲说：“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长此覆灭下去。”<sup>⑤</sup>

1938年4月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在它的《创立缘起》中说：“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sup>⑥</sup> 在《成立宣言》中则说“它的成立，是为了服务于抗战，服务于这艰苦的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要培养抗战艺术干部，提高抗战艺术的技术水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得艺术这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sup>⑦</sup>

1939年5月，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文艺运动在内）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争取对于各种文化工作团体、机关的影响，特别对于各种文化工作团。”<sup>⑧</sup>

1940年7月，朱德在“鲁艺”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指出“一个好的艺术家，应当同时是一个政治家”。号召艺术家“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努力成为“卓越的艺术家和‘英勇的伟大的战士’”<sup>⑨</sup>。

1941年4月，朱德在“部队艺术学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部队艺术要从打仗入手，方法要艺术。八路军天天打仗，离不开对敌人及群众的宣传，因此部艺的学员应练习战斗的生活与宣传的才能”<sup>⑩</sup>。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抗战的形势对革命文艺的要求是迫切的，革命文艺面临的任务是伟大的、艰巨的。

### （三）革命文艺的状况

革命文艺能否适应时局的迫切要求，完成历史赋予的艰巨任务呢，这就需要看看当时的文艺状况了。

关于五四以来的文艺，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



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在指出五四运动的贡献和功劳的同时，毛泽东也深刻地指出了这个运动的缺点和不足，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sup>①</sup>再有就是五四时期文艺界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以上所讲五四运动的伟大贡献和不少缺点，都对革命根据地的文艺状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革命根据地，文艺得到了健康迅速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反映抗战初期的作品，发挥了革命文艺应有的积极作用。

随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深入人心，许多追求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了抗日，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从敌占区和国统区涌入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这些有较高文化水平或受过专门文化艺术教育的热血青年的到来，壮大了根据地的革命文艺队伍，为革命文艺大军增添了新鲜血液。他们投身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发挥他们的文化艺术才能，对根据地的文艺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讲话》发表前，仅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就相继成立并活跃着许多文化艺术协会和文艺社团（以前各章已述及）。这些文艺团体、艺术院校以及他们所办的文艺刊物，配合着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有相当的成绩，但与革命斗争形势的要求相比，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正如朱德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创立二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讲的那样：“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然也还热闹，但是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

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亲密地联合起来。”他还说：“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们英勇牺牲于战场，还不知道他们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也是你们文艺的罪过。”<sup>⑫</sup>

造成这种明显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从敌占区和国统区陆续集中于抗日根据地的大批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并不是说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程度不同地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他们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他们常常以这样的思想作风对待新的环境、新的群众和新的文艺事业，常常感到不协调甚至格格不入。这种情形，到了1941年以后，由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进一步尖锐激烈以及根据地生活条件的进一步恶化，而显得更加突出起来。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创作实践上往往不注意、不善于描写工农兵群众，而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予同情甚至鼓吹”；而且还表现在理论上由于认识的模糊和混乱而产生的一系列争论问题。比较集中的有：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关系问题，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文艺创作同学习马列主义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有争论的问题，归结起来，实质上就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sup>⑬</sup>

除去创作上的不良倾向和理论上的糊涂认识外，更有甚者，则以杂文的形式把根据地說成“到处乌鸦一般黑”“好像连人对

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围绕着这样的作品，延安文艺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批判。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其“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sup>⑭</sup>。

## 二、文艺座谈会的准备与召开

为了开好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和党中央事前做了多方面的充分的准备工作。

### （一）把座谈会纳入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1月20日在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中宣部宣传要点》，同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从此，在全党范围内，便开展了普遍的整风运动。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时，正是处于普遍的整风学习阶段。各文艺协会和团体，先后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这对座谈会的召开，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思想准备。在文艺工作者整风学习中，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者与人为善，尖锐彻底；被批评者态度诚恳，虚心坦诚。大多能掌握马列主义思想方法，认识作家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性，扫除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情绪，造成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大的

环境和氛围，“脱掉裤子割尾巴”（即割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的形象说法成了当时的流行语，这就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顺利召开做了政治思想上的准备。

## （二）广泛调查研究

为了开好文艺座谈会，从1942年2月下旬起，党中央和毛泽东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首先，直接了解文艺创作情况，帮助和指导革命文艺工作者搞好文艺工作。毛泽东随时留意当地文艺刊物和报纸发表的作品，注意文艺界的争论，时常观看文艺演出，与文艺工作者交朋友。通过这些活动，毛泽东了解了许多文艺情况。如1942年2月，延安美协举办了讽刺画展，毛泽东、叶剑英、王稼祥、艾思奇等先后参观并予以赞扬。后来毛泽东还邀请这次画展的作者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到枣园谈意见。舒群担任《解放日报》文艺栏主任之后，不断得到毛泽东的直接关心和指导，倘有社长博古审而难定的稿件，均由舒群携稿面呈毛泽东定夺。他与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谈话，一方面是直接了解情况，讨论问题，一方面又请他们帮助收集有关情况。如，1942年4月9日毛泽东给作家、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一信：“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sup>⑮</sup>

与欧阳山、草明谈话后，4月13日毛泽东又致欧阳山、草明一信：“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sup>⑯</sup>

在收到欧阳山、草明回信后，4月17日，毛泽东再致他们一信：“四月十五日来信阅悉，我现在尚不能够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作答复，待研究一下罢。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不知文艺室同志有

暇为此否？”<sup>①7</sup>

毛泽东还给诗人艾青一信：“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艾青去后，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的……你看怎么办？”接着就和艾青一起讨论了解决办法。两天后，再次给艾青写信：“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搜集反面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sup>①8</sup>随后，他们又有书信往来或面谈。

此外，毛泽东还于4月13日，约见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几位党员作家，到杨家岭就文艺问题交换意见。又约见了周扬、丁玲、舒群、李又然、萧向荣、刘白羽等十几位同志。通过这些广泛的调查研究活动，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胜利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此间，毛泽东还研读了鲁迅的文论著作和《海上述林》中瞿秋白译介的恩格斯等的文艺论著，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和系统思考。

### （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过程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1942年4月10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出的决定。“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sup>①9</sup>

毛泽东请周扬、舒群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名单，他又补充了自己所惦记的一些文艺工作者，邀请他们参加文艺座谈会。4月27日，中央办公厅按照名单制作并分发出一百多份油印的粉红色油光纸请帖，上写：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同志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如期召开，5月23日圆满结束。其间，开了三次大会，其余时间则是分组讨论。

第一次大会是5月2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会议室召开的。与会近百人，“会议室里摆着一张铺白布的长方形桌子。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朱总司令等，他们坐在一头，围着这个主席台的桌子，三面都放了许多椅子、方凳和长凳。多数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都坐在椅子和凳子上。也有一部分人坐在长方形桌子的另一头”。毛泽东身穿灰布衣服，走进会场时，“到会的人都站了起来。从西边起，由陪同的同志向毛主席介绍文艺界的人。毛主席一一握手。”<sup>②0</sup>

会议由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主持。毛泽东讲了话（就是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他首先简要地说明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接着讲述了文化大军对于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他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后来《讲话》正式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人”），这两支军队都“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军队。随后，他回顾了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的形成、发展情况，指出当前的文艺工作

者所面临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问题提得尖锐而又中肯。特别是毛泽东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知识分子接触工农，感情转变的过程，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讲话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直至傍晚。

第二次大会是5月16日召开的，会场仍是在中央办公厅一楼会议室。这次大会发言，气氛非常热烈。毛泽东、朱德等到会认真地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并时有插话。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在发言中讲到他们下乡演《小放牛》受到老百姓欢迎，老百姓送许多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慰劳他们。柯仲平自豪而诙谐地说：“你们要找我们民众剧团，怎么找呢？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听到这里，许多人开心地笑了。毛泽东边笑边插话：你们如果老是演《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sup>②0</sup> 这次大会讨论发言进行了一天。

第三次大会是5月23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一百多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康生、凯丰、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博古、刘白羽、罗烽、草明、田方、张悟真、陈波儿、丁玲、李伯钊、瞿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绩伟、李卓然、天蓝、江丰、李雷、艾思奇、欧阳山、姚时晓、王震之、袁文殊、王曼硕、刘岷、石泊夫、郑文、于黑丁、陈企霞、吕骥、丁浩川、郁文、陈伯达、傅钟、萧向荣、何思敬、陈学昭、张庚、罗工柳、王滨、干学伟、曹葆华、欧阳山尊、胡采、马加、曾克、周立波、张振武、高阳、张仃、刘雪苇、蔡若虹、胡蛮、金紫光、伊明、林默涵、周扬、艾青、钟敬之、李丽莲、潘奇、唐荣枚、许珂、张水华、任虹、魏东明、宋侃夫、钟纪明、公木、范文澜、杜矢甲、于敏、张桂、严文井、陈荒煤、何其芳、张铁夫、阿甲、张季纯、张贞麒、张望、佟天林、华君武、李又然、李元庆、向隅、萧军、柯仲平、

童大林、陈叔亮、古元、胡一川、吴伯箫、严辰、蔡天心、江帆、舒群、殷参、王朝闻、马达、杜赟、贾芝、吴印咸等。<sup>②②</sup> 会议室挤得满满的。中间休息时，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和与会者到室外操场上照了合影，摄影师是吴印咸。

大家发言后，朱德总司令讲了话，他针对有人看不起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文艺，却高喊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的说法，批评并提醒他们“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又针对发言中提出的否认鲁迅思想有转变的论点，指出“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并结合自己的经历说：“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了德国，才入了党。我投入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他还号召大家要多写反映前方的军事斗争、反映后方的生产斗争的通讯和报告文学，并针对“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说法，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他还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穿的住的东西比延安好。但那再好，是人家的啊！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sup>②③</sup>

朱德讲话之后，乘着西斜的阳光，在室外由吴印咸为与会人员拍照合影，为这次会议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最后是毛泽东讲话，也就是为大会做结论。他首先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



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做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sup>24</sup>

接着，他就根据会前调查研究的情况，和讨论中反映出的问题，结合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成绩与不足以及根据地革命文艺的现状，为座谈会做结论，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这一结论共有五部分，到天快黑时，只讲完了第一部分，于是，便留大家在杨家岭吃晚饭，饭后继续开会。由于许多人听说毛泽东讲话的消息，也纷纷赶来听，人数增加了许多，会议室容纳不下，会场便移到了室外的空地上。来不及布置，便搬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在桌子旁，用三根木杆支起三角形的架子，吊起一盏汽灯，由毛泽东继续讲话。讲话结束时已是深夜了，大家怀着兴奋的心情离开了会场。座谈会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与会者的脑海中，在以后的岁月里，时时引起他们美好而自豪的回忆。而毛泽东的《讲话》则作为珍贵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永远地载入中国革命文艺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史册。

为了做好“结论”，毛泽东提前两天（即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一下“结论”的要点，以听取意见，使“结论”更完善。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sup>25</sup> 5月28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讲了文艺座谈会的情况和《讲话》的主要精神，以统一全党认识，贯彻文艺新方向。<sup>26</sup>

### 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于